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九卷)

[清]张之洞
(1837年~1909年)

“中体西用”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40 - X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清]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40 - X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 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上 篇

张之洞洋务教育活动和
“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时代和生平	(1)
洋务教育活动	(5)
(一) 谋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5)
(二) 兴办洋务教育	(11)
洋务教育思潮	(20)
(一)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21)
(二) 洋务教育思潮勃兴过程中的论争	(26)
《劝学篇》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37)
(一) 《劝学篇》的导读	(37)
(二) 《劝学篇》的内容分析	(47)
(三) 《劝学篇》的主旨	(50)
(四) 对《劝学篇》的评价	(52)
(五) “中体西用”思想的演变	(54)
(六) 中体西用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	(57)
晚年的教育活动	(59)
(一) 废除科举制度	(59)

(二) 建立新学制	(61)
附: 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	(62)
(一) 从技术层面看科举: 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	(62)
(二) 从制度层面看科举: “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65)
(三) 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 “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69)

下 篇

张之洞教育文论选读

劝 学 篇(节录)	(77)
序	(77)
外 篇	(80)
游学第二	(80)
设学第三	(82)
学制第四	(84)
变科举第八	(86)
招考自强学堂学生示并章程	张之洞(89)
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	张之洞(92)
奏创办水陆师学堂折	张之洞(95)
办理水陆师学堂情形折	张之洞(98)
创设陆军学堂附设铁路学堂折	张之洞(101)
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	张之洞(103)
《东塾读书记》引朱子论科举	(104)
节录欧阳公《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庆历四年)	(105)
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	张之洞、刘坤一(106)

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20)
重订学堂章程折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23)
学 务 纲 要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26)
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	(151)
奏请递减科举折	袁世凯、张之洞(158)
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162)
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	
.....	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166)
附: 复张之洞书	沈翔云(171)

附 篇

张之洞《劝学篇》与福泽谕吉 《劝学篇》的比较

福泽谕吉《劝学篇》与张之洞《劝学篇》之比较	(187)
福泽谕吉《劝学篇》导读	(198)
《学问论·劝学篇》选读	(213)
(一) 告别故乡中津记	(213)
(二) 劝学篇第一篇	(217)
(三) 劝学篇第二篇	(222)
(四) 劝学篇第九篇	(226)
(五) 劝学篇第十篇	(230)
(六) 关于增长知识见闻的问题	(234)
(七) 学问的独立	(237)
(八) 要晓得汉学已经失效	(251)
(九) 要提高洋学的地位	(253)

上 篇

张之洞与教育舌和 “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时代和生平

中国近代社会是空前动荡、变化的时代,充满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变化剧烈。张之洞就是出生在这样的时代。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号壶公,晚年称抱冰老人,死谥文襄。先世是山西省洪洞县人,后迁至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八月初三日生于贵州省的兴义府官舍(今贵阳)。当他刚刚懂得人情世故时,已是列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张之洞的曾祖父张怡熊,曾任浙江山阴知县,以廉洁闻名于当地。祖父张廷琛,字献侯,贡生,为四庠誉录,曾任福建古田知县。父亲名张 ,字又甫,号春潭,少孤,境遇坎坷,勤奋好学,嘉庆年间任职贵州安化县,后调古州同知,任兴义府知府,因参加镇压苗民起义,死后清政府追赠他为贵东兵备道、太仆寺卿。其母朱氏,是四川邛州知州朱绍恩之女。张之洞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4岁丧母,由继母抚育。

张之洞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这对他维护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对他忠君爱国的政治生涯不无影响。

张之洞幼年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自幼养成勤奋好学的习惯。道光二十一年,5岁的张之洞开始了学习生活。入塾读书,专心努力,学习识字必懂方止。张之洞父亲主张博览群书,认为“姑令纵观,不解无妨,浸灌既多,长大后自有解者”。所以,张之洞幼年时

便学习经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其父家教甚严,以勤俭、朴素、努力好学加以勉励,告诫说:“贫,吾家风,汝当力学”。严格的家庭教育,以及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给张之洞以后在仕途中忠于职守有重要的影响。他11岁起学作诗文,记诵绝人,进步很快,有神童之称,受到塾师的嘉许。

道光三十年(1850年),张之洞入南皮县学,进一步受到正规的封建教育。这对他成为封建政权的忠实卫道者有重要影响。

中国自隋朝建立科举制度以来,凡欲作官为宦,必须经过科举考试。到了清朝,凡科举出身的被称作“正途”,尤其为一般知识分子所追求。

科举制度在中国教育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是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它影响、指挥着学校教育。可以说,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控制教育的重要工具,知识分子若想挤入仕宦行列,就必须按照科举考选人才的标准去塑造自己。

张之洞也是遵循着“读书——科举——为官”的公式踏入社会的。咸丰二年(1852年),16岁的张之洞参加顺天府乡试,考取第一名举人,这是他走向仕途的第一步。同治二年(1863年)张之洞参加会试,中一甲第三名,称探花,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1867年)张之洞任浙江乡试副考官,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他考课极严,录取生员多为朴学之士,知名者50多人。

同年八月就任湖北学政,他勤于教务,认为“学政一官,不仅在衡校一日之短长,而在培养平日之根底。不仅以提倡文学为事,而当以砥砺名节为先”。在他看来,学校应该以“砥砺名节”,“培养根底”为教育目的。也就是说,应该将年轻一代培养成为遵守封建纲常名教,效忠统治者的后备军。本着这种思想,他书写一幅试院楹联,上联是: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页,商务印书馆。

上清帝奏章,转引自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1页。

“剔弊何足云难,为国家培养人才,方名称职”;下联是:“衡文只是一节,愿诸生步趋贤圣,不仅登科。”这幅楹联正反映了张之洞为官初期注重旧学,主张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和纲常名教的思想。

张之洞生活的年代,正是清朝国势日衰,财政枯竭,武力软弱,内外交困,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张之洞从维护封建政权的立场出发,妄图通过教育培养出“砥砺名节”、“步趋贤圣”的人才,以挽救濒于覆灭的封建王朝。在任职学政不久,循例发题“观风”(命题考试士子),希望通过对知识分子的考核,发现“经世致用”的人才。他在给下属的命令中指出,题目发下后,可由生员任选,以期各尽所长,共相磋切,讲求实学,“务得通经学古之士,经世致用之才”。到任后的第二年,在他主持下,就测试了汉阳、黄州等府和武昌各地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他创立经心书院于武昌,分经义、治事两科,广收优秀学员。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整顿学风,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学生,颇得众望。

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张之洞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八月,任四川学政。四川地处西部边陲,又因平定太平天国余部和苗族人民的起义不久,战后学校尚未恢复,试场舞弊积习已久,攻讦冒籍顶替者不绝。考生以舞弊为能事,考官不仅不予追究,反而索取重贿,以渔利为本分。面对弊端累累的四川教育现状,他立志整顿。在给清廷的奏章中表示,要“整饬士习,培养人才,剔除弊端,体恤寒畯”。为了改变不景气的四川教育,他与总督吴勤惠(吴棠)商议,筹建尊经书院,亲自制订学规章程,延聘名儒,分科讲学。鉴于边疆地区购书不易,他捐款购买图书数千卷,并建尊经阁为藏书之所。他还鼓励士绅捐款助学,筹集学田,作为办学经费。每逢余暇,则亲到书院讲

上清帝奏章,转引自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第21页。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12页。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卷一,17页。

学,并著《窩轩语》和《书目答问》,传授读书方法,提高学生品德修养。戊戌变法运动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就是尊经书院的优秀生。

光绪七年(1881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他立志整顿山西吏治,勤考吏属,振作革弊,罢废贪污害民的县官,严禁鸦片,荐举人才。除一般政务外,尤其重视文教工作。到任后不久,首先制订明备所乐舞生章程,派专人赴山东置作乐器、祭器,请直隶定州乐师、舞师来山西训练乐舞技艺;然后,积极整顿科举考试,大修贡院,改变山西科举考试中存在的弊病;他还创办令德堂,选全省高材生入堂学习经史古学,聘请王轩总校事,杨深秀为襄校,杨笃为襄校兼监院。王轩治之礼、许氏说文,兼及金石。杨笃精之礼,训诂尤专。王、杨皆治朴学,承乾嘉老辈师法,不为俗学所囿。所以,在堂诸生都精经史古学,乙酉乡试凡史学词章有根柢者,多为堂中肄业学生。杨深秀后成为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

张之洞在兴办的各种学校中,十分重视旧学、经学和纲常名教为重要学习内容。其所建经心书院、尊经书院均“令诸生通经学古”;在令德堂又设经史古学。以后在湖北、广州所办书院中,也设经学、史学、理学、经学诸门。甚至在戊戌变法运动之后,维新变法思想已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时候,他在湖北创存古学堂,仍以旧学为主,以保存国粹相标榜。他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明确表示:鉴于“道微文敝,世变愈危”,所以创存古学堂“以存国粹,而息乱源”,教育学生“以忠孝为归”,“以圣经贤传为本”,以实现“崇正学,明人伦”的培养目标。这是张之洞教育思想中保守的一面,也是重要的一面。

从以上各节可以看到,张之洞走入仕途的第一个命官就是教育官。以后,多次出任文教官职。如光绪三年(1877年)充教习庶吉士,光绪五年(1879年)任国子监习业,光绪六年(1880年)授翰林院侍讲,光绪七年(1881年)授翰林院侍讲学士,在巡抚、总督任内,也

重视教育工作。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掌管中央学部事务,参预制订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法定颁布施行的学校系统,即《奏定学堂章程》,并任经筵讲官。在他的一生中,他参预制定了晚清的教育方针政策,厘订过学校规章制度,创办了许多旧式的和新式的学校。他长时期从事教育工作,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有重大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教育家。

洋务教育活动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是后期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是洋务教育的积极兴办者和洋务教育思想的阐述者。研究张之洞的教育思想,首先应该分析和研究他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谋富求强的洋务运动

张之洞是洋务派后期的重要人物。在他出任山西巡抚时(1884年),已经初具洋务思想。他认为,山西“风气未开,洋务罕习”。当他来到山西后的次年,就提议设立洋务局,招募“习知西事,通达体用”的洋务人才。他列举有关“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致、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诸端,但有涉及洋务,一律广募”。不论是“兼通各学,还是只通一艺,无不量才委用”,并“优其资薪”,通报全省各机关执行。此外,他还向全国发出“延访洋务人才启”广为招聘。他全力开展洋务运动,是从任两广总督时开始的。

这一时期,他搞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现略举数端,以示证明:

光绪十一年(1885年),议设枪炮局于南宁。

光绪十二年(1886年),在广州设广东缫丝局。

光绪十三年(1887年),在广州设机制铸钱局及银元局,设电报学堂,办水陆师学堂。

光绪十五年(1889年),在广州设广东织布局、广东制铁局。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汉阳设汉阳铁政局、枪炮厂,开采大冶铁矿、萍乡铁矿,设方言商务学堂,选译西书。

光绪十八年(1892年),派工匠赴比利时学习炼钢技术。

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武昌设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设自强学堂。

光绪二十年(1894年),议设水泥厂于大冶。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前,张之洞就搞了许多洋务活动。甲午战争后,他便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张之洞早年常与一批不掌握实权的京官结纳,评议时政,以不避权势相标榜,享有“清流派”之名。清流派是清同治光绪年间政府内部出现的一个政治派别,他们议论时政,弹劾权贵,特别是对掌握朝廷大权的李鸿章十分不满。他们出身科甲,谙熟经书,议论批评时常引经据典,颇能说理,在知识界享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们的意见往往被当作社会舆论的代表,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当时,张之洞与侍郎宝廷、侍讲张佩纶、通政黄濬兰,被称为翰林“四谏”。张之洞的发迹和对李鸿章的抨击有关,他的一些活动,钳制了李鸿章的势力,深得某些满族贵族的赏识,优予升擢,不久就成为封疆大吏。张之洞到了湖北局势力更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一跃而为洋务新贵,成为洋务派的重要首领。

光绪五年(1878年),清政府平定了阿古柏的入侵,收复新疆。但俄国沙皇政府妄图霸占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全权大臣与沙皇交涉索还伊犁,昏聩无能的崇厚,与沙皇政府签订了《伊犁条约》,使沙

俄得以攫取我国伊犁的许多特权。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张之洞上书奏陈俄约贻害,请修武备,改约,给崇厚以应得之罪。嗣后张之洞创广雅书院于广州,他不避非议,延聘因弹劾李鸿章投降政策获罪的梁鼎芬和因奏请预防宦官流弊、弹劾李莲英获罪的朱一新二人为主讲,显示了“清议”之风。

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边疆告急,张之洞主张抗战。他提议起用老将冯子才和原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同抵抗侵略者,清政府采纳了张之洞的意见,取得谅山大捷,连连打击法国侵略者,越地东至北宁太原河内,西至兴化宁平南定山西,官民响应,连战连捷,迫使法国侵略者罢战求和。张之洞在反对法国侵略的问题上,态度明朗,积极支持抗战,受到人们普遍赞誉,清廷也为此发布上谕嘉奖张之洞。

《马关条约》签订后,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震惊,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也忧虑重重,惟恐因此失去人心,无法维持统治,纷纷上书,力陈地不可割、款不可偿,要求废约再战。张之洞对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极为不满,给予无情的抨击。他说:“大约稍有心肝之人皆必不可为之,稍有知识之人必皆能见之,而不谓渥蒙国恩,深悉时务之李鸿章竟悍然不顾,冥然罔党,行人之所不肯行之事,出人所不忍出之言。……直至今日始灼然有以知其心术之幻而得其罪状之真。”他十分气愤地说:“恐宋臣秦桧明臣仇鸾之奸尚未至此也。”并大胆地指出,李鸿章所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朝廷有“畏倭之心”。当然,也应指出,张之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能够、也不可能立足于依靠人民的力量,而是企图“以夷制夷”,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甚至妄图以国家的权益去换取俄、英、法等帝国主义遏制日本,这是其阶级本性的表现。尽管如此,他坚决反对日本侵略是正确的,应当加以肯定。

特别是在割让我国台湾的问题上,张之洞态度更为明朗。在战

争期间,他十分关心台湾的防御,致电台湾巡抚唐景崧,分析台湾抗倭的有利条件,鼓励唐景崧“必能御倭”。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为台湾抗击日本侵略者输送军饷、武器。并且表示:“如台湾再有急需,敝处必代为筹措”。御史易顺鼎说:“台北饷械多出自香帅所助”。他直接支援了台湾的抗敌斗争。不仅如此,当他听到李鸿章密约出卖台湾的勾当以后,就立即给清廷发电,奏陈台湾战略地位重要,电文说:“查台湾极关紧要,逼近闽浙,若为敌踞,南洋永远事事掣肘”,一再告诫清廷,和约实关大局安危,必须详加斟酌,否则“悔不可追”。并要求清廷“权衡至当”,“断然不允”。但封建统治者为了自身的苟安,不惜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终于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获悉台湾割让给日本以后,极为愤慨,沉痛地指出,“从此中华何以自立?”“此后何论自强?直恐不能自立矣!大局败坏,切齿痛心!”。

虽然《马关条约》已经签订,但张之洞仍不甘心,提出“台湾自保”的建议,致电唐景崧、刘永福,请求他们通力合作,依靠台湾人民,“军民合力战守”,增强信心,“足可取胜”。并想方设法由美轮运枪三万支,以武器支援台湾的抗倭战争。这些事实,不能不认为是爱国行动,应当给予恰当的评价。

张之洞大举兴办洋务时,客观环境已不同于曾、李的洋务时期。光绪中叶以后,经过中法战争,那种仅仅依靠“船坚炮利”的“自强、求富”的方针,已无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张之洞另辟蹊径,提出“治、富、强”的洋务纲领,强调先富而后强。张之洞除了关心发展军事工业外,更注意民用企业的发展。他在两江、湖广总督任内,注意吸收商民办厂、开矿。例如,他主办的湖北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织布、纺纱、制麻、缫丝四局,都是官督民办企业。这些企业除官资

易顺鼎:《盾墨拾余》卷六《魂南记》。

以上引文均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五)。

外,召集私人资金入股,企图集合私人资金开辟“求富”渠道,使早期民族资本得以“稍分洋商之利”,这些措施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这也是后期洋务活动的一个特点。

张之洞大搞洋务活动的时候,维新变法思想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影响着社会舆论和推动着社会变革。因此,“变”与“不变”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中心。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封建制度的腐朽已暴露无遗,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统治下去。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延缓革命的爆发,维持封建的统治,统治阶级不得不同意进行某些方面的改良。这一点,张之洞是清楚的。他为了获取人们的支持,也装出一副拥护变法的样子,而且屡屡发表变法意见,以致使一些人被他的假象所迷惑,误认为他是“变法派”。

张之洞主张“变法”是以维护封建统治这个总目标为出发点的。

他以古论今,大发议论。说什么,“徵之史,封建变郡县,辟举变科目,府兵变招募,车战变步骑,租庸调变两税,归余变活闰,篆籀变隶楷,竹帛变雕版,笱豆变陶器,粟布变银钱,何一三代之旧乎?”从以上议论来看,似乎张之洞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其实,他主张的“变”,并不是封建制度本身,而是封建制度的某些具体措施。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就十分明白了,他认为可变的只不过是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机械工艺,甚至也可以学一点西方的新鲜货。然而,封建主义的“伦纪”、“圣道”、“三纲”、“四维”是绝对不允许变的。他认为,“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有史以来,自五帝、三皇以来没有改变过,现在也不能变。这是“古今之常经,中西之通义。”十分清楚,张之洞的“变法”同他的前辈一样,只不过是讲求“洋务”,即学习

《劝学篇下》,《变法第七》。

《劝学篇下》,《变法第七》。

《劝学篇上》,《同心第一》。

一点西方的生产技术和某些规章制度,来延续清王朝的统治而已。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不过是历来主张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论罢了。

“变”是当时大多数人所赞成的,关键是怎样变。是实行维新派所主张的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封建制度呢?还是洋务派所提倡的学习西方一些科学技术,修补封建制度中不适应的部分,以延续封建统治呢?张之洞主张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他的“变”是以“变器不变道”为原则的。

我们知道,到了洋务运动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单纯学习西方的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西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法律等措施的“西政”也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张之洞所提倡的“西学”,在内容方面不同于前期洋务派,不仅包括“西艺”,而且屡屡提到“西政”。例如光绪二十七年两个月内的三次上书都是这样。第一次,《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提出兴学育才的四条建议;第二次,《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提出整顿中法的十二点措施;第三次,《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提出包括派员出洋留学、考察,学习外国军事,发展农业、工业,制定各种法规,发展邮政事业,翻译西书等为内容的十一条采用西法的措施。

总观张之洞办洋务的指导思想,就是“会通中西,权衡新旧”。就是说,一方面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某些政治措施,另一方面又不使这些“西艺”、“西政”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最好使“中学”、“西学”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这也是他们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怎样采用“西艺”、“西政”呢?张之洞说:“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假如离开了“补吾阙者”和“起吾疾者”,则宁可不用“西学”。所以,尽管张之洞

《抱水堂弟子记》。

张之洞:《劝学篇·内篇》。